清史研究前沿·八旗制度实践

齐齐哈尔驻防八旗达呼尔十六牛录编设始末

金　鑫

［摘要］ 康熙二十九年冬，为免遭巴尔虎流民扰掠，以齐齐哈尔村为中心的嫩江下游达呼尔人众，自请披甲为兵。为充实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力，清廷于次年初允其所请，责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办理挑兵、筑城事宜。原隶布特哈打牲部落的8个达呼尔贡貂牛录随即被改编为16个官兵牛录，有领催、披甲额兵千名。其驻防城定名齐齐哈尔，但选址在嫩江东岸卜奎站附近，约于康熙三十二年秋竣工。康熙三十一年，4个新编达呼尔官兵牛录赴博尔德看守官仓，后归入墨尔根城驻防八旗。而原隶墨尔根的4个达呼尔牛录，则因将军衙门移驻，于康熙三十九年迁来齐齐哈尔。雍正五年，为筹集墨尔根添设汉军所需军饷，齐齐哈尔城达呼尔额兵终被削至960名。

[关键词] 黑龙江　驻防八旗　齐齐哈尔　达呼尔　康熙朝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26）－01－0014－010

康熙中叶，清廷先后五次自布特哈打牲部落征召索伦（今鄂温克族）、达呼尔（今达斡尔族）壮丁披甲，以之充实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力。继康熙二十三至二十九年（1684—1690）分四批组建23牛录1400名索伦、达呼尔官兵，① 与满洲、汉军同驻瑷珲、墨尔根两城之后，又于康熙三十年专以达呼尔贡貂牲丁编设16牛录千名官兵，使之驻守新建齐齐哈尔城。《盛京通志》《钦定八旗通志》《大清会典则例》《龙沙纪略》《黑龙江外记》诸书虽不乏齐齐哈尔八旗驻军建制情况的记载，但对其达呼尔诸牛录的来历却均语焉不详。以《锡伯族档案史料》汉译的部分黑龙江将军衙署档案为据，《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一文简要梳理过齐齐哈尔的建城原委，但并未就达呼尔官兵的编设问题展开探讨。② 若干有关黑龙江地方史、达斡尔族史的论著，程度不等地涉及了康熙年间该处编设的达呼尔驻防官兵，但或因史料不足，或为主旨所限，均未能将其原委梳理清楚。③ 笔者在全面搜集《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所藏满文史料的基础上，就

［收稿日期］ 2025－05－28

［作者简介］ 金鑫（1982—　），男，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呼和浩特 010030，jinxin821223@163.com

① 金鑫：《雅克萨之战前后的达斡尔五百官兵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金鑫：《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穷索伦"、站丁牛录考》，《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② 满都尔图、杨优臣：《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孟志东主编：《中国达斡尔族通史》上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278–279页；吴雪娟：《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满语研究》2004年第2期；阚凯：《清康熙年间黑龙江地区达斡尔人编旗驻防考实》，《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王秀峰：《康熙朝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沿革考》，《历史档案》2022年第1期。

该16牛录达呼尔官兵的编设经过、驻地安排、建制员额等问题做一全面考述，期以对传世史志、前人研究的种种缺憾有所补益。

一、齐齐哈尔八旗达呼尔官兵的编设背景

《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曾指出巴尔虎牧民因战乱自喀尔喀逃亡嫩江流域危及当地社会安定，是清廷在齐齐哈尔建城、编设达呼尔驻防官兵的重要促成因素。遗憾的是，该文并未就巴尔虎流民的具体活动做任何考述。为揭示当时达呼尔人众对筑城、披甲的紧迫需求，将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组建的起因解释清楚，有必要就此事的梗概做一简要梳理。

康熙二十七年准噶尔部统治者噶尔丹东侵漠北，喀尔喀三汗部纷纷南迁入内扎萨克蒙古居地避兵。康熙二十九年夏，准噶尔军复阑入漠南搜寻车臣汗、土谢图汗部众，并于乌尔会河击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所率清军。慑于其兵威，车臣汗所属巴尔虎、喀尔喀人众纷纷东逃入嫩江流域打牲索伦、达呼尔居地。七八月间，散处于布特哈辖境的巴尔虎、喀尔喀人丁已达五六千之众。因家产多丧于战乱，部分人为饥寒所迫，开始劫掠本地居民。额尔赫绰克图台吉属下千余齐卜齐诺特姓巴尔虎人首先肇事，杀害贡貂牲丁两名，殴打理藩院员外郎的随行领催，踏毁索伦达勒巴赉牛录所种田地，并捆打前往责让之人。① 阿海岱青属下托恭昆、乌朗郭特两姓千余巴尔虎人亦很快加入，布特哈总管玛布岱随即又向理藩院呈报抢掠牲只、毁坏耕稼、打劫官差等不法案件共7起。为制止暴行，玛布岱特遣佐领阿尔宾与其领主交涉。额尔赫绰克图台吉等虽派出使者阿巴岱，勒令作乱巴尔虎人众交出所掠财物，但对方却将阿巴岱拘执折辱，并搭箭恐吓阿尔宾说："闻满洲兵已为厄鲁特所败，尔等往何处去？田宅能抬去何处？尽杀汝总管，尔等皆为我辈之虏获而已。"②

见其本管领主亦不能约束，玛布岱等认定唯有武力弹压一法可行，因之两次向理藩院告急，请求朝廷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设法弹压。八月二十日，理藩院先将额尔赫绰克图台吉属下暴行奏上，请旨令萨布素出兵，于当日获上谕批准。九月初三日，复奏准弹压托恭昆、乌朗郭特乱众。十五日，萨布素遵旨率满洲、索伦、达呼尔兵六百自墨尔根出发，于二十日赶至楚尔噶勒村，与玛布岱所率牲丁六百会合，一同前往弹压。在该村附近驻牧的托恭昆、乌朗郭特两姓巴尔虎人，因先已悔罪听命，并未遭到驱逐。唯在齐齐哈尔村东南60里察哈诺啰处的额尔赫绰克图台吉属众，在官军兵威震慑下，于月底逃离布特哈。③

二、齐齐哈尔城的兴建决策

康熙二十九年冬，考虑到准噶尔军仍有东犯之虞，以齐齐哈尔村为中心的嫩江下游一带诸达呼尔牛录的贡貂牲丁，一致想要披甲为兵。他们将这一请求上报总管衙门，继而由玛布岱转呈理藩院，并在次年六月萨布素致理藩院的咨文中被原样抄录，内容如下：

> 我辈父祖自黑龙江投顺圣主，徙居嫩江以来，四十余载遭逢太平，散居六百里余，随意安生。今人云厄鲁特、喀尔喀相攻，若众巴尔虎等困穷之人，知我各村间隔居住，肆意侵扰，虽

---

① 《理藩院为谕准弹压额尔赫绰克图属下行劫流民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2盘第3册，第307–322页。

② 《理藩院为谕准将阿海岱青属下行劫流民逐出卡伦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三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2盘第3册，第323–335页。按，正文中引文系笔者汉译。下同。

③ 《将军萨布素为报知驱逐行劫巴尔虎流民情形事咨理藩院文》，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2盘第4册，第265–310页。

欲保护妻子，一时不能收集……若我等披甲，于居所附近一形势之地筑城，俾有收聚行走之处，愿抵死舍命，奋勉效力，以报皇上恤养之恩。①

可见，其所以甘愿披甲，主要是想获得朝廷的武装及建筑城池的许可，以便在战乱再起时自卫。流民暴乱期间，布特哈尚为藩属部落，并未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故萨布素对其保护请求反应迟缓，必待朝廷降旨才肯行动。这些达呼尔人请求披甲，自然也是为了转隶将军麾下，以便危急时能得到八旗驻军的及时保护。暴乱平息后，巴尔虎流民对布特哈总管依旧不甚服从。康熙三十年二月，有乌朗郭特姓巴尔虎人盗马，玛布岱派人追讨，但对方却表示："我等唯将军之言是瞻，无听从尔总管之理。"② 依旧不容乐观的安全形势，以及总管衙门应对危机的无力，也无疑会进一步坚定嫩江下游达呼尔牲丁改换门庭、加入驻防八旗的决心。

对此，理藩院并未立即审议具奏，而是要求玛布岱先与黑龙江将军协商，将披甲筑城的实施细节筹划清楚。康熙三十年正月十七日，正在京城朝觐的萨布素密奏：

墨尔根城与乌拉吉林悬隔千四百余里，万一有调遣之事，则约集师旅，难期迅捷。松花江自南向北，嫩江自北向南，川流绵长，交于土谢图之地，③ 经东省各部落居地而汇入北海。乌拉吉林至嫩江口五百里，嫩江口至齐齐哈尔五百里，齐齐哈尔至墨尔根约五百里。其内齐齐哈尔地方，系蒙古、锡伯、索伦、达呼尔等居地交汇之要冲，且通兴安以北呼伦等地，至尼布楚之路亦不甚远。是故，应于齐齐哈尔附近驻扎一旅之师。再松花江、嫩江合流处，既系水陆总汇要津之地，亦当驻兵一支。如此则齐齐哈尔、嫩江口俱可为长江④ 藩篱，兼得其地之利，土田沃衍，草场丰茂，马匹因而肥壮，兵甲借以雄强，居守则甚称巩固，出师则颇形勇锐。虽有紧急之事，由墨尔根向南彼此接续调遣，当无迟延之虞，且若兴安以北有事，此一方之兵会合，可以相机行事。⑤

显然，着眼于整体的东北边防战略，萨布素也力主在齐齐哈尔一带建城驻军。经雅克萨之战、《尼布楚条约》签订，"东、南至吉林，西至蒙古喀尔喀部，北至俄罗斯，广轮数千里"⑥ 均已为清廷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但此时该处的八旗驻军尚不足三千，仅有瑷珲、墨尔根两城，与所应维护的辽阔疆域极不相称。尤其是墨尔根与宁古塔将军所辖吉林乌拉城距离过远，中间存在广阔的军力真空地带。齐齐哈尔位居嫩江下游，一旦建城驻兵，不仅可与上游的墨尔根及黑龙江畔的瑷珲连成一线，形成纵贯本省全境的布防格局，也可填充两将军辖区间的防御空档。遇有边警，既可南下联结吉林乌拉等处官兵，应援科尔沁蒙古，亦可北上会合墨尔根、瑷珲之兵，守护兴安岭以北呼伦贝尔、黑龙江上游边地。萨布素奏请建城的要地，还有嫩江、松花江汇流处，即后来归属宁古塔将军的伯都讷城。这更说明无论达呼尔人众是否自请披甲，在墨尔根至吉林乌拉间建城驻军，都是清廷势在必行之事。前引康熙三十年六月萨布素致理藩院的咨文，抄录有正月二十三日就此事下达的上谕："著不误农时，乘闲筑城。"齐齐哈尔一带的城池兴建及嫩江下游达呼尔牲丁的编伍工作，随即拉开序幕。

齐齐哈尔城虽得名于嫩江西岸的齐齐哈尔村，实际上却建于对岸的卜奎驿站附近。对此

---

① 《将军萨布素为议定齐齐哈尔诸村达呼尔牲丁编旗披甲事宜咨理藩院文》，康熙三十年六月初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2 册，第 36–41 页。

② 《总管玛布岱为乌朗郭特姓巴尔虎不遵约束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1 册，第 49–50 页。

③ 原文作 tusiyetu i ba。tusiyetu 指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土谢图亲王。因该亲王为蒙古科尔沁部贵族之首，故此处以"土谢图之地"来指称嫩江、松花江汇流处一带属科尔沁部的前、后郭尔罗斯等旗。

④ 原文作 golmin giyang。giyang 为汉语借词"江"，故可直译"长江"，应指松花江。

⑤ 《将军萨布素奏齐齐哈尔一带形势冲要合应建城驻军本》，康熙三十年正月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6 册，第 7–12 页。

⑥ 西清：《黑龙江外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73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14 页。

《黑龙江外记》有如下解释："相传始筑城议在齐齐哈尔，既以中隔嫩江不便，改今地。"[①] 即指黑龙江地方的驿站交通线及将军衙门驻地墨尔根城均在嫩江东岸，如于齐齐哈尔村建城，则通信务须往来摆渡，极为不便。就在其朝觐期间，康熙帝已降旨将布特哈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故萨布素返任后，便将建城细务直接交给已成为其属员的布特哈诸总管筹办。三月初二日玛布岱等致萨布素的咨文，载有其关于城池选址的最初构想：

> 谕命建城一事告知我等以来，将莫和尔村至额呼穆齐村相应嫩江对面查看，未寻得筑城后附近适宜种田之处。唯卜奎站之地似可，然须占用驿站田宅，不知其可否。再者，既有旨令将军筑城，非我等所可擅断。我等意以为，既此间周回无合适之地，其究应于讷谟尔河博尔德处筑城，或将呼裕尔河喀喇勒图旧城修缮进驻，抑或拨给卜奎站之地筑城，请将军定议，作速咨来。因农时已近，拟于议定之处预先垦地。[②]

上引史料清楚地表明，清廷最初并未明确将城址选在齐齐哈尔村。而达呼尔人众自请披甲时，也只是要"于居所附近一形势之地筑城"，同样没有属意于齐齐哈尔村。莫和尔村即今黑龙江省龙江县华民乡莫呼村，位于齐齐哈尔市区西南 50 公里嫩江西岸。[③] 额呼穆齐村即今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卧牛吐镇额尔门沁村，位于齐齐哈尔市区东北 35 公里嫩江西岸支流阿伦河东岸。[④] 两村之间由南至北，恰好涵盖嫩江下游西岸的整个达呼尔人居地。玛布岱等选址仅在其"相应嫩江对面查看"，无疑是因萨布素有令在先。据此看来，《黑龙江外记》所谓初拟于齐齐哈尔村建城，后因通信不便而改在卜奎的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从建城决策伊始，清廷就已将齐齐哈尔诸村对面的嫩江东岸框定为城址的勘选范围。于卜奎筑城之议最初是由玛布岱提出的，理由是该处地势平衍，不仅便于建城，近处还有充足的可耕地，便于官兵建立旗屯。考虑到在此建城，必然会与将军衙门所辖驿站争地，他在请求萨布素出面裁决的同时，又提出了博尔德村、喀喇勒图旧城两个备选项。但前者与墨尔根相距过近，后者又偏离了嫩江干流及驿站交通线，所以卜奎自然也就成了新城基址的唯一选项。

三、十六牛录达呼尔官兵的编设

齐齐哈尔诸村达呼尔人丁的编旗披甲，是与齐齐哈尔城的修建同时进行的。前引康熙三十年六月萨布素致理藩院的咨文，载有其初步拟定、请求理藩院代为议奏的征兵办法：

> 除无栖止之所，游牧行走之索伦、鄂伦春外，于齐齐哈尔等村达呼尔内酌取千丁，均齐编佐，使之披甲。一旦披甲，则彼等无法私行打牲，故应停征貂贡，照常发给钱粮。若依省城之例，俾富者城居，贫者乡居，则种地不难，有事可收入城中。

其首先明确了此次募兵的具体范围，即只征召嫩江下游定居农耕的达呼尔人，不包括牧猎为生、居无定所的索伦、鄂伦春。甲兵员额定为一千，系历次于布特哈征兵最多的一次。在官兵生活的安排上，建议免除其貂贡，照例发给俸饷。针对理藩院前此提出的"聚处一处，穷人等种地有无困难"的问题，又主张以富者留居城内，穷兵仍居乡村的办法来解决。

七月，上述办法经议政大臣覆奏，获康熙帝批准。萨布素随即拟定奏报了具体的官兵编设方案，于八月十日再获谕准。十六日，兵部将该结果咨告萨布素，于九月十九日送抵墨尔根城，

---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731 册，第 714 页。原文嫩江本作"嫩汗江"。按，嫩江系满文 non ula 汉译，清代或作诺尼江（non i ula），而从无嫩汗之称，故该"汗"字应属衍文。

② 《总管玛布岱等为请定夺建城基址以便预先垦田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年三月初二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1 册，第 67–68 页。

③ 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152 页。

④ 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第 158 页。

内中完整抄录有萨布素先前所奏编设方案。据此可知，此次征兵并非从布特哈各达呼尔牛录散抽人丁，而是直接将嫩江下游的 8 个打牲牛录整体收编入伍，除挑壮丁千名披甲外，老弱也一并收为附丁、余丁。新编官兵牛录共 16 个，各有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兵缺或 62 名或 63 名。这些牛录的旗籍均为上三旗，6 个属镶黄旗，5 个属正黄旗，5 个属正白旗，而为适应军务上的实际需要，三旗除各留两牛录外，其余 10 个牛录均予拨出，以之分组下五旗。在萨布素的奏议中，各牛录的佐领、骁骑校早已先期选定，朝廷亦一一照准。佐领有 8 位本系打牲佐领，另 8 位是原来的打牲骁骑校；骁骑校则从白身牲丁中，选武艺出众、能约束人众者担任。可见，萨布素应是以原打牲牛录的骁骑校各带本牛录一半人众分出的方法，来另编新牛录。为便于管控，萨布素除提出以玛布岱为齐齐哈尔城驻防八旗主官外，又决定从将军衙门调两员满洲章京来协助练兵，并规定该城重大军政事务均应报请将军裁决，从而明确了新编达呼尔官兵对黑龙江将军衙门的隶属关系。①

九月二十二日，萨布素以前奏编旗方案已获朝廷批准，致函玛布岱遵照办理。② 十月，又令传集新编各牛录男丁，以比试步射来挑补领催、披甲兵缺。③ 至均匀派定旗色时，因官兵们“俱争上色旗，不从我言，皆声言赴将军处呈控”，玛布岱只得请求将军衙门按其在瑷珲、墨尔根亲族的旗分，来裁定新编诸牛录各自所应使用的旗色。④ 十一月，萨布素将亲自拟定的旗色分配结果交玛布岱照办，该批次达呼尔官兵的编设工作大体告竣。⑤

表 1　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初设十六牛录达呼尔官兵建制

旗色	佐领	骁骑校	领催	披甲	旗籍
镶黄	博哩喀	岳勒噶乌勒	6	56	镶黄
	郭尔弼岱	锡欣图	6	57	
正黄	弼齐勒图	索卜提库	6	56	正黄
	库特内	格卜格德依	6	57	
正白	鄂博图	阿都岱	6	56	正白
	阿尔宾	济喇乌勒	6	57	
正红	布勒哈岱	海沁保	6	56	镶黄
	弼勒格德依	达哩	6	57	正黄
镶白	昆都勒德依	达卜柴	6	56	镶黄
	苏雅勒图	鄂尔魁	6	57	

① 《兵部为前拟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官兵编设诸款业获谕准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年八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5 册，第 125–134 页。

② 《将军萨布素为前拟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官兵编设诸款业获谕准事咨副都统衔玛布岱文》，康熙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329–338 页。

③ 《副都统衔玛布岱为齐齐哈尔诸村挑选披甲并请将老弱附入旗佐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年十月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1 册，第 343 页。

④ 《副都统衔玛布岱为恳祈裁定齐齐哈尔新编十六牛录官兵应用旗色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年十月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1 册，第 342 页。

⑤ 《将军萨布素为分定新编十六牛录官兵移拨旗色事咨副都统衔玛布岱文》，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417–418 页。

（续表）

旗色	佐领	骁骑校	领催	披甲	旗籍
镶红	图都	额特布	6	56	正黄
	多勒退	哈尔库赉	6	57	正白
正蓝	布斋	图正额	6	56	正白
	奇林泰	诺恩岱	6	57	镶黄
镶蓝	朝噶岱	穆哩勒图	6	56	正白
	额哩德依	库尔伯勒图	6	57	正黄

资料来源：《将军萨布素为领取齐齐哈尔城官兵秋季俸饷事咨盛京户部文》，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13 册，第 216–219 页。

考虑到玛布岱以理藩院系统的三品打牲总管身份，不便节制已经编入八旗，转隶兵部系统的达呼尔佐领、骁骑校各官，萨布素复奏请加玛布岱副都统衔，赏给二品俸禄。此议于八月十二日经兵部覆奏，十六日获上谕批准，至九月底始传达到玛布岱处。[①] 此后，其便开始以“副都统衔”（meiren i janggin i jergi）或“副都统衔章京”（meiren i janggin i jergi janggin）的身份行使对齐齐哈尔城新编八旗驻防官兵的总辖权。

早在八月初，萨布素已按户部要求，题奏齐齐哈尔达呼尔官兵应领当年秋季俸禄、钱粮共计 13973.5 两。[②] 据其官兵员额推算，具体的发放金额应是副都统衔年俸 155 两，佐领 105 两，骁骑校 60 两，领催月饷 3 两，披甲 2 两，符合正规直省驻防八旗的俸饷发放定制。十一月，萨布素又致函兵部，为新编达呼尔官兵请领军械，并强调务必发给七至十力硬弓。[③] 次年，所需军械分三批陆续送来。八月送到弓 1032 张、梅针箭 54 800 枝；十月送抵官兵盔甲 1016 套、帐篷 532 顶、纛旗 16 面、铁枪头 500 个、弓箭罩 1032 套；十一月又送来官盔甲 16 套，以及鞍具、撒袋、腰刀、盔缨、衬帽、盔罩、甲包等各 1032 件。[④] 为便于维修军械，萨布素还奏准为这些达呼尔牛录各配备弓匠 1 名、铁匠 1 名。[⑤]

四、城池的兴建与达呼尔官兵之移驻

《黑龙江外记》称齐齐哈尔内城系“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具雖（雉）堞之观，四门皆有楼橹，方一千三十步，崇丈八尺……康熙三十一年筑”。[⑥] 但档案所载该城的始建时间及最初形制却并非如此。康熙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萨布素明令玛布岱调集嫩江下游行将编旗的达呼尔官

① 《将军萨布素为请加副都统衔业获谕准事咨副都统衔玛布岱文》，康熙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327–329 页。

② 《将军萨布素题报达呼尔十六牛录官兵员额及一季应需俸饷确数本》，康熙三十年八月初四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4 册，第 295–298 页。

③ 《将军萨布素为齐齐哈尔达呼尔官兵请领强弓事咨兵部文》，康熙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6 册，第 280–281 页。

④ 《兵部为解运齐齐哈尔官兵应领军械事咨将军萨布素三文》，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八月日期无、九月初七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3 册，第 277、345–346、370–372 页。

⑤ 《兵部为谕准照瑷珲墨尔根例于齐齐哈尔添设工匠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3 册，第 372–374 页。

⑥ 西清：《黑龙江外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731 册，第 721 页。

兵，以及嫩江中上游继续贡貂的达呼尔牲丁，准备在卜奎站一带筑城。[1] 次日，又由墨尔根城派工匠骁骑校麦鲁及领催两名赴卜奎，“俾指点土城建造程式”，并以四月初二日为吉日，要求在当天“将四面丈定，开始动土”。[2] 可见，齐齐哈尔城动工兴建的时间应为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二日，且其最初式样应为土城。

达呼尔人众需要的仅是各村危急时的避难之所，但清廷实际筹建的却是设有官厅衙署、需要常川驻兵的城镇。城址选在东岸的卜奎，更意味着新编官兵需要搬离西岸的旧居，或轮流渡江到新城应差。因其颇有抵触情绪，玛布岱在接到于卜奎建城的命令后，又以不便占用驿站田地为由出言劝阻，称：“既有损驿站人丁，可否于齐齐哈尔村掘壕，引水建城？”但萨布素明确否决了这一建议，回复道：“墨尔根城既在对岸，值江水泛涨，若有一应公务，则难矣！”这样，玛布岱只得率众赴卜奎动工，至四月二十二日即以新城“虽尚未完工，然大体已具”，请示将军应如何修造城门。[3] 可见，与《黑龙江外记》的描述正相反，在齐齐哈尔村建城之议，其实是为劝说将军收回在卜奎筑城的成命，而由总管玛布岱在后提出的。二十三日，萨布素通知卜奎站：“筑城时占用驿站公田几许垧，俾达呼尔人等照数垦给”；至于站丁的私田，则承诺“除圈在城内，实在不得耕种者外，城壕周边可种之田仍准站人耕种”；还严令筑城人丁宿营务必远离驿站耕地，放牲口、运砖不得随意开路。[4] 由“运砖”（feise juwere）一语来看，当时所建土城应是以夯土为基、外层包砖的内地式城墙。

萨布素三月二十六日部署城池动工日期的咨文，曾一并指示从齐齐哈尔村附近诸达呼尔牛录各挑富户二三家搬迁，但并未得到积极响应。前引玛布岱建议改在齐齐哈尔村建城的咨文，就提到骁骑校索卜提库等坚称搬迁之议恐系玛布岱自作主张，海沁保更是声言只有先将嫩江中上游的达呼尔牲丁迁来，自己才会搬迁。康熙三十一年三月，萨布素再令诸村富户搬迁，又遭其集体抵制。双方的交涉经过，在萨布素敦促玛布岱执行迁徙政令的公函中有详细记载。[5] 时佐领鄂博图等赴玛布岱处请愿，指出永戍卜奎新城，与其自请建城的初衷大相径庭，且于官兵生计多有不便，希望改在西岸齐齐哈尔村一带筑城。其议如下：

> 建此城时，乃以嫩江为限，我等自忖系今后有事，则收入城中，无事仍在旧地耕种为生，故前亦甘愿建之。今既将一千官兵披甲编佐，聚众永驻，种地之时，地方狭窄、多沙，倘逢水涝，仅剩丘陵，平地皆为大水所冲，粮谷因之不获。今既土城坍塌而建木城，诸大人垂怜，将我等呈诉之处转行将军，恳祈奏请在齐齐哈尔等处建城驻防。

显然，上年所建齐齐哈尔土城此时已经坍塌，而达呼尔官兵们就是想借改建木城之机，来说服官方重新选址。但萨布素先已奏请将新编 24 个牛录锡伯官兵亦迁来卜奎驻扎，故对其另择城址的呼吁极为不满。在给玛布岱的答复中，他指出齐齐哈尔、音沁两村均有人在东岸开辟私田，鄂博图等称新城一带易发洪涝系片面之词；如嫌城周地狭多沙，南面特木德黑站、东面呼裕尔河一带皆有宜耕之地；即使无力在东岸垦地，将军衙门仍准许官兵们在西岸旧田设“屯”（tokso），于农时返回耕作。为此，除重申务必于年内继续在卜奎建城盖房外，萨布素还明令禁

---

① 《将军萨布素为传令达呼尔人丁赴卜奎站筑城事咨总管玛布岱文》，康熙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107 页。

② 《将军萨布素为遣匠役传授土城筑法并布置工期事咨总管玛布岱文》，康熙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109–110 页。

③ 《总管玛布岱为达呼尔富户拒绝迁往卜奎新城请差员晓谕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1 册，第 132–134 页。

④ 《将军萨布素为补偿被占驿站农田事咨茂兴等处管站官关保文》，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9 册，第 275–276 页。

⑤ 《将军萨布素为佐领鄂博图等请求停止迁往卜奎新城一事毋庸议由咨副都统衔玛布岱文》，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6 册，第 64–67 页。

止就城址问题再生异议，否则“将为首者劾以重罪”。

是年二月，玛布岱在呈报城工、公田的劳役征调办法时，提到布特哈的剩余达呼尔牛录须“各出三十人力，往取份木”。①这表明齐齐哈尔的土城确已塌毁，所以才会组织伐木，以便改建木城。康熙三十二年正月，萨布素致函玛布岱，提出再遣达呼尔及锡伯兵丁各一百、达呼尔及索伦牲丁各二百伐木。②六月底，玛布岱以“城工当在七月十日前完毕”，拟于秋收前兴建城门、楼橹，请求萨布素拨给工匠及铁料。③可见，新修齐齐哈尔木城的围墙部分应于康熙三十二年七月上旬建成，辅助设施至迟亦当在七八月之交竣工。

五、建制员额的调整与定型

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官兵编设后不久，陆续有 4 个牛录被转调至博尔德城。康熙三十年，清廷自布特哈抽牲丁 300 名，在讷谟尔河北岸达呼尔村落博尔德附近垦种公田，为黑龙江驻防八旗储备军粮。为确保其仓廪安全，萨布素于次年六月上奏朝廷，请求由齐齐哈尔抽出两牛录 125 名达呼尔兵，携眷迁往博尔德驻防，归墨尔根城节制。④同年十月，康熙帝降旨于墨尔根原有 500 名满洲、汉军鸟枪兵外，增练索伦、达呼尔鸟枪兵，将总数扩至千名。⑤而为进一步增强将军衙门驻地兵力，萨布素奏请再从齐齐哈尔划拨两牛录 125 名达呼尔兵给墨尔根城，继而又以可耕地有限、不便安置，将这些官兵迁往博尔德。⑥上述官兵与后续编设的 4 个牛录陈巴尔虎官兵一起，于康熙三十四年另组博尔德城驻防八旗。当年十一月萨布素为该城请领俸饷的公文显示，由齐齐哈尔先后转调至博尔德的，分别是镶黄旗郭尔弼岱、正红旗弼勒格德依、镶黄旗博哩喀、正黄旗库特内等 4 个达呼尔牛录。⑦康熙四十年，新任黑龙江将军沙纳海奏准裁撤博尔德驻防八旗，该部分达呼尔官兵遂又移戍墨尔根城。⑧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清廷决定将黑龙江将军衙门迁往齐齐哈尔。墨尔根城驻军，除保留索伦 10 个牛录、达呼尔 1 个牛录共 650 名兵外，其余 4 个达呼尔牛录 250 名兵，连同所有满洲 580 名兵、汉军 220 名兵，一并迁至齐齐哈尔永戍。⑨拙作《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穷索伦”、站丁牛录考》曾指出，新迁至齐齐哈尔的是正白旗霍啰鼐、镶白旗温都尔汗、正蓝旗多尔开和额勒颇彻等 4 个牛录达呼尔官兵。额勒颇彻、霍啰鼐牛录系康熙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以布

---

① 《将军萨布素为照准由披甲及贡貂达呼尔公同承应公田城工劳役事咨副都统衔玛布岱文》，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6 册，第 55–56 页。

② 《将军萨布素为调整建城伐木劳力抽派数额事咨副都统衔玛布岱文》，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初七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4 盘第 1 册，第 4–6 页。

③ 《副都统衔玛布岱为增派工匠以便赶造城门城楼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4 盘第 6 册，第 117–118 页。

④ 《将军萨布素题请将齐齐哈尔城达呼尔两牛录官兵移往博尔德驻守粮仓本》，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13 册，第 118–120 页。

⑤ 《将军萨布素题报遵旨于墨尔根城增练五百鸟枪兵本》，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13 册，第 263–265 页。

⑥ 《兵部为原议移驻墨尔根之达呼尔两牛录官兵谕准改遣博尔德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14 册，第 252–256 页。

⑦ 《将军萨布素为请领博尔德城官兵一年两季俸饷事咨宁古塔将军文》，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5 盘第 13 册，第 243–246 页。

⑧ 《兵部为谕准将博尔德城官兵迁往墨尔根城事咨将军沙纳海文》，康熙四十年三月初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9 盘第 8 册，第 64–72 页。

⑨ 《兵部为墨尔根城索伦达呼尔官兵去留方案业经奏准事咨将军萨布素文》，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7 盘第 15 册，第 72–80 页。

特哈处穷丁编设，温都尔汗、多尔开牛录系康熙二十九年以先前调用为墨尔根至瑷珲之间五处驿站站丁的布特哈人众编设，成员均以达呼尔为主，但混编有部分索伦。档案记载，该 4 个牛录还曾根据齐齐哈尔原有达呼尔官兵的配置情况，重新调整旗色。霍啰鼐牛录改拨至正红，温都尔汗牛录仍归镶白，多尔开牛录拨至正黄，额勒颇彻牛录拨至镶黄，恰好填补了先前改驻博尔德诸达呼尔牛录的空缺。①《黑龙江外记》介绍齐齐哈尔的佐领官缺设置时，有"索伦四员、达呼尔十二员"之表述，并补充道："齐齐哈尔索伦近日式微，其佐领额缺皆为达呼尔所并。"②《盛京通志》言及"齐齐哈尔驻防"的职官设置时，却仅有"(康熙)三十年将达呼尔人等编设佐领十六员"的记载。③ 如前所述，随将军衙门迁来的实为 4 个达呼尔牛录，只是混编有部分索伦兵丁。《龙沙纪略》载康熙末年"卜魁"的索伦兵数为 74 名，仅占该 4 个牛录额兵的三成。④ 这些达呼尔牛录与同期编设的索伦 11 个牛录，其兵员均出自生计困苦的牲丁、站丁，且总体以索伦为多数，故康熙中叶的档案常概称其为"穷索伦"(yadara solon)。为此类公牍误导，西清才会错以为齐齐哈尔曾额设过 4 个索伦佐领。

《大清会典则例》所载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建制沿革，于索伦、达呼尔之兵仅记有"(康熙)三十年设驻防齐齐哈尔索伦、达虎里千名……(雍正)五年……裁齐齐哈尔驻防达虎里四十名"。⑤ 如前所述，齐齐哈尔驻防初创时的一千官兵纯为达呼尔，其混编有少数索伦官兵，是康熙三十八年以后之事。至于雍正五年(1727)该城达呼尔兵缺的少量裁减，档案显示是由墨尔根城添设汉军所致。时因墨尔根副都统多奇纳奏报属下仅有装备刀矛弓箭的索伦、达呼尔官兵，而无善使火器、战船之兵，于边防不利，清廷决定将齐齐哈尔的两个汉军牛录移往墨尔根。考虑到齐齐哈尔城 4 个牛录汉军驻扎已久，如将两牛录整体迁走，对其生计触动过大，署将军傅尔丹于四月初五日又奏请在墨尔根另设两牛录百名汉军。为免增兵加饷，他建议将齐齐哈尔、瑷珲共 6 个汉军牛录的兵额划一为 50 名，从而匀出 40 名多余的汉军；将两城 24 个索伦、达呼尔牛录的兵额俱压缩至 60 名，又可空出 60 个新的汉军甲缺。⑥ 齐齐哈尔原有 16 个达呼尔牛录，兵额或 62 名或 63 名，各居其半，应裁之兵恰为 40 名。正因如此，《钦定八旗通志》所载该城兵力，才会有"索伦、达呼尔兵九百六十名"之说。⑦

六、结语

齐齐哈尔 16 个牛录达呼尔官兵的编设，是康熙中叶黑龙江地方军事驻防体系构建的重要一环，对巩固东北边防具有重要意义。千名达呼尔丁壮披甲，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初黑龙江边防兵力的空虚局面。齐齐哈尔城的兴建，更使清廷在嫩江下游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有助于强化对邻近科尔沁、喀尔喀诸蒙古部落的控御力度，遏阻沙俄对额尔古纳河以东我国领土的蚕食企图。这些达呼尔官兵世代承应戍守卡伦、巡查边境、屯种公田、维持城旗衙署运转等繁杂差务，且不时奉调参加平定边疆割据势力、反击外敌侵略的重大战事，

---

① 《将军博定为汇报辖下各城八旗官兵员额事咨兵部文》，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12 盘第 11 册，第 47–61 页。原齐齐哈尔镶黄旗 2 个牛录迁往博尔德后，该城镶白旗昆都勒德依牛录已改归镶黄旗。

② 西清:《黑龙江外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731 册，第 729 页。

③ 《盛京通志》卷 52《兵防二·黑龙江将军所属》。

④ 方式济:《龙沙纪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851 页。

⑤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174《八旗都统·兵制》。

⑥ 《署黑龙江将军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等题请酌裁齐齐哈尔黑龙江达斡尔披甲缺添设汉军牛录移驻墨尔根本》，雍正五年四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第 6 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21 年，第 267–283 页。

⑦ 《钦定八旗通志》卷 35《兵制志四·八旗驻防兵制》。

为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与巩固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大量达呼尔人众自相对闭塞的布特哈打牲部落改隶齐齐哈尔八旗，在驻防城镇及周边旗屯，与其他各族官兵比邻杂处，与内地商民密切交往，也有力推动了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商品货币观念、传统风俗习惯、儒家意识形态的传入，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及改造该族整体社会风貌的同时，又兼具强化其对“大一统”的认同心理、增强其与各兄弟民族间凝聚力的深远意义。

References

Mandultu, Yang Youchen. “Dawoerzu yu xingjian qiqihaercheng kaoshu” (A textual study of the Daur ethnic grou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iqihaer town). *Minzu yanjiu* (Ethno-national Studies)4(2001).

Wu Xuejuan. “Kangxi nianjian Heilongjiang zhufang baqi de chuangjian” (The foundation of garrison eight banners in Heilongjiang in Kangxi times).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2(2004).

Jin Xin. “Yakesazhizhan qianhou de dawoer wubai guanbing kaoshu” (Investigation on the five hundred Daur officers and soldi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Battle Jaxa).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1(2011).

Kan Kai. “Qing kangxi nianjian heilongjiang diqu dawoerren bianqi zhufang kaoshi” (On the Dawoer garrison in Heilongjiang area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Shanxi dat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2013).

Wang Xiufeng. “Kangxichao qiqihaer zhufang baqi yange kao”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Qiqihar garrison eight banners in the Kangxi period).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1(2022).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xteen Daur Niru in the Qiqihar Eight Banners Garrison

JIN X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jinxin821223@163.com)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1690, to protect against raids by displaced Bargu nomads, the Daur communities centered in Qiqihar Village in the lower Nen River region petitioned to enlist as soldiers. To reinforce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forces in Heilongjiang, the Qing court approved their request in early 1691 and tasked General Sabsu of Heilongjiang with organizing troop selection and city construction. Eight Daur tribute-sable Niru origin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Butha hunting tribes were reorganized into 16 military Niru, comprising 1,000 armored soldiers. The garrison city was designated “Qiqihar” though its location was established near Būkei Station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Nen River, with construction completed around the autumn of 1693. In 1692, four newly formed Daur Niru were dispatched to Būrde to guard government granaries,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the Mergen Eight Banners garrison. Meanwhile, four Daur Niru originally under Mergen relocated to Qiqihar in 1700 following the transfer of the general’s Yamun. By 1727, to fu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Han Army garrison in Mergen, the Daur troop in Qiqihar was reduced to 960 soldiers.

Keywords: Heilongjiang, Eight Banners Garrison, Qiqihar, Daur, Kangxi Reign